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政治学系列 ·

总主编 华世平

第三波

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美] 塞缪尔·P·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著

欧阳景根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第三波

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美] 塞缪尔·P·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著
欧阳景根 译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美)亨廷顿著；欧阳景根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
ISBN 978-7-300-14875-5

I. ①第… II. ①亨… ②欧… III. ①民主运动-世界-20世纪 IV. ①D59
②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0900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美] 塞缪尔·P·亨廷顿 著
欧阳景根 译
Disanbo: 20 Shiji Houqi de Minzuhua Langcha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9.75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8 000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在西方，有关政治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和阐发，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也产生了十分丰富和系统的政治思想，孔子、孟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治国理政的学说，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是 19 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

事实上，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起步并不算晚。20 世纪初，西学东渐，政治学课程开始在国内少数大学中讲授，如果从 1905 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只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短二十几年。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甚至一度中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按照邓小平关于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的意见，做了大量工作，编写出版了一批教材和学术专著，引进了一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政治学著作，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应当说，政治学的重建工作成绩斐然。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发展中的不足。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特别是与邓小平提及的“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相比，我国政治学的发展速度似乎更慢些，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似乎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到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既然中国现代政治学是由西方传入的，那么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学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进而发展中国本土的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当然，西方的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其学术观点、理论预设等也不完全为我们所认同，但对处于相对落后的中国政治学来说，以开放的思想对待西方的理论，通过比较、鉴别、有选择地吸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自主创新，不失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条捷径。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国内外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精诚协作，组织翻译出版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出版这套译丛，旨在将过去半个世纪西方政治学的经典学术著作系统地译介给中国读者，为国内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总的来看，这套译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权威性。所选著作均为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些著作已经得到国外学界的一致认可，并在西方主流学界被反复引用。丛书作者包括罗伯特·A·达尔、塞缪尔·P·亨廷顿、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安东尼·吉登斯、伊恩·夏皮罗、约瑟夫·S·奈、罗伯特·普特南……一个个政治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构成了这套译丛强大的作者阵容。

第二，全面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一些政治学著作被陆续译介到中国来，但这种翻译出版不是系统性的，而是零散的。本套译丛是国内系统地、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国外政治学著作的第一次尝试，它试图涵盖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包括比较政治、政治学基础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思

潮、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

第三，前沿性。本套译丛选择了西方政治学领域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如新制度主义、后行为主义、全球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等的著作，以期促使国内政治学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能较为及时地了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

本套译丛于 2008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策划和组织出版，并邀请美国路易威尔大学的华世平教授担任译丛总主编，他对部分原著的推荐、译者的选择以及译丛的编辑出版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十分感激！参与本套译丛翻译工作的译者大多是本领域的学术骨干和中青年专家，都具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并有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政治学系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本套译丛的翻译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限于水平，这套译丛的编校工作还存在些许不妥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5 月



序 言

本书探究的是 20 世纪后期重要的、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大约有 30 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的转型。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 1974—1990 年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本书兼具理论与历史色彩，但它既非一部理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它介于二者之间，它首先是一部解释性的论著。一种好的理论不但应该精确、严谨和优雅，而且还能凸显出若干概念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的是，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充分解释一个孤立事件或一组事件。相反，其解释难免杂乱无章、晦涩难懂，而且在知识的意义上并不能令人满意。理论解释成功的法宝不在严谨，而在它的全面。一部好的历史著作，通常按编年方式对一连串事件进行描述，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并且说明一历史事件引发了另一历史事件的原因。本项研究不做这种描述和分析。它并不去详细说明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民主化的一般过程，同时也不去描述个别国家的民主化情况。反之，它尝试去对发生在一个有限时段内的



一组特定的体制转型进行解释与分析。用社会科学的行话说，本研究既非研究一般规律，也非研究特殊规律。因此，理论家和史学家都可能认为本书并不能令人满意——它并没有提供前者珍视的一般规律，也没有后者所看重的深度。

因此，在研究取向（approach）上，本项研究与我其他几部著作有着很大不同。在我其他那些著作中，我试图得出有关一些关键变量间的一般性概括或理论，诸如政治权力与军队职业化、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等。关于这些关系的理论主张一般是作为不受时间限制的真理提出来的。然而，在本书中，这些理论概括仅仅限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孤立事件。诚然，本书的一个要点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不同于早先发生的民主化浪潮。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曾不时地想要提出诸如“政权取代要比主动转变更为暴力”的永恒真理。然后，我又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的证据仅仅来源于我所研究的有限的历史个案，而且我正在撰写的是第一部解释性的著作，而非一部理论专著。因此，我不得不放弃无时间限制的现在时，而在行文时以过去时代之：“政权取代在过去表现得比主动转变更为暴力。”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我都是这样做的。在有些情况下，命题的普遍性看起来是如此明显，以致我情不自禁地用更为超越时间界限的语气来表述它。然而，还有一点，几乎没有一项命题能完全适用于所有第三波的个案。因此，读者会发现一些“倾向于”、“一般来说”、“几乎总是”以及遍布全文随处可见的诸如此类的修饰语。而从我的最终行文看来，上述命题应该解读成：“政权取代在过去通常表现得比主动转变更为暴力。”

本书写作于1989—1990年间，当时有关的一组事件还正在发展之中。所以，本书会遇到同时代性的所有问题，并且必须看做是对这些体制转型的初步评估与解释。本书借鉴了对这些特殊事件有着详尽论述的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的著作。同时，本书还广泛依赖于对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这样，当第三波民主化宣告结束时，才有可能对这一现象作出更为详尽和更尽如人意的解释。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项我以前对政治变迁的研究中，我主要关注政治稳定的问题。我之所以撰述此书，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秩序是一件好事。我的目标是要得出一种关于秩序能否实现的原因、手段和背景条件的一般社会科学理论。而当前的这一著作关注的是民主化。我之所以研究它，是因为我相信，民主本身就是一件好东西，而且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论述的，我还相信，民主会给个人自由、国内稳定、国际和平以及美国带来积极后果。正如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一样，我努力使我的分析尽可能地远离我的价值准则；至少在本书中有 95% 的内容是这样。然而，在我看来，讲清楚我的研究对于渴望在其社会实行民主化的人所具有的意义，确实偶尔是有作用的。因此，在本书中有 5 个地方，我放弃了社会科学家的角色，而承担起了政治顾问的角色，并为民主化的实施者提出了一些“民主化的指导原则”。如果这些使我看起来像一个雄心勃勃的民主派的马基雅弗利的话，那就由它去吧。

直接促成我写作此书的因素是 1989 年 11 月俄克拉何马大学给我发出举行罗斯包姆讲座的邀请。在那些讲座中，我提出了本书的主要命题，当然，当时缺乏用以支撑这些命题的经验证据。本书的大部分手稿写于 1989 年年底到 1990 年间，而且我也并没有任何打算要把 1990 年后发生的事件纳入我的分析中。我非常感谢俄克拉何马大学卡尔·阿尔贝特议会研究中心及中心主任罗纳德·M·皮特斯博士（Ronald M. Peters），感谢他们邀请我举行这些讲座。我和我的妻子南希（Nancy）还想表明，对于我们俄克拉何马大学期间，皮特斯博士、罗斯包姆夫妇、乔尔·詹考斯基以及众议院院长阿尔贝特夫妇自始至终给予我们的帮助和热情款待，我们深表感激。

尽管讲座邀请促成了本书的写作，但本书的材料却一直在我心中酝酿至今。在手稿的个别地方，我采用了以前两篇文章，它们是：《会有更多国家变得民主吗》（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 Summer 1984, pp. 191–218）和



《最为中庸的民主含义》(The Modest Meaning of Democracy)（收录于 Robert A. Pastor ,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Stopping the Pendulum*,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9, pp. 11–28）。1987 至 1990 年间一个叫做约翰·M·奥林民主与发展研究员 (John M. Olin Fellowship i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的研究职位，使我得以花费更多时间和努力来对本书的主题进行研究，而如果没有这一职位，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许多人或有心或无意地为书稿作出了贡献。从 1983 年起，我就在哈佛大学教授了一门有关现代民主的核心课程，这是一门专注于民主转型问题的课程。我的学生和教学助理们都会承认，本书的绝大多数材料都来自于这一课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评论和批评，我对这一主题的想法才会比本来的样子好得多。玛丽·基拉里 (Mary Kiraly)、李永珠 (Young Jo Lee)、凯文·马奇奥罗 (Kevin Marchioro) 和亚当·博森 (Adam Posen) 为本书材料的研究和这一主题文件的整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杰弗雷·茨姆巴罗 (Jeffrey Cimballo) 不仅很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还在手稿的最后准备阶段审查了文本和脚注的准确性。朱丽叶·布莱凯特 (Juliet Blackett) 和艾米·恩格尔哈特 (Amy Englehardt) 运用他们非凡的文字处理技术，有效、迅速和准确地提供了多个版本的手稿初稿，并对这些初稿做了无数次的修改。我的几位同事阅读了手稿的全部或一部。侯昌·车哈比 (Houchang Chehabi)、爱德文·科尔 (Edwin Corr)、乔治·多明格茨 (Jorge Dominguez)、弗朗西斯·哈格比安 (Frances Hagopian)、艾里克·诺德林格 (Eric Nordlinger) 和托尼·史密斯 (Tony Smith) 提出了富有思想的、批评尖锐而且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书面评论。哈佛比较政治学讨论小组的成员对手稿的前半部分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丹克沃特·A·拉斯托 (Dankwart A . Rustow) 具有建设性地指出了精装本中图 1—1 的四处遗漏，在这一版本中已得到更正。

对所有那些对拙著怀有兴趣的人、对所有那些为拙著之质量的提

高而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我深表感谢。不过在最后我要声明的是，本书的观点、证据和错误，都应由我负责。

塞缪尔·P·亨廷顿

于麻省剑桥

目 录

第一章	发生了什么？	1
一、	第三波的肇始	1
二、	民主的含义	3
三、	民主化浪潮	9
四、	民主化的问题	21
第二章	为什么发生？	29
一、	对浪潮的解释	29
二、	对民主化浪潮的解释	32
三、	解释第三波	38
四、	正在衰落的合法性和政绩困境	43
五、	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	54
六、	宗教变革	66
七、	外部力量的新政策	77
八、	示范效应或者滚雪球	90



九、从起因到起因制造者	94
第三章 如何发生？民主化的过程.....	106
一、威权政权.....	107
二、转型过程.....	116
三、主动转变.....	119
四、政权取代.....	134
五、交相改变.....	142
第四章 如何发生？民主化的特点.....	157
一、第三波民主化之共相.....	157
二、妥协和参与/适度交易	158
三、选举：既出乎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166
四、暴力的低水平.....	182
第五章 持续多久？	202
一、巩固及其问题.....	202
二、施虐者的问题：起诉和惩处 VS. 宽恕与忘怀	204
三、军事执政官问题：忤逆成性而又力量强大的军队.....	222
四、背景性问题、幻想破灭与威权怀旧.....	240
五、培育一种民主政治文化.....	244
六、对民主政治行为进行制度化.....	250
七、有利于新兴民主政权巩固的条件.....	254
第六章 何去何从？	268
一、第三波之根由：持续、削弱，还是发生改变？	269
二、第三波回潮？	276
三、进一步民主化：障碍与机遇.....	280
四、经济发展与政治领导层.....	296

索引请参见 <http://www.crup.com.cn/gggl>。

第一章 发生了什么？

一、第三波的肇始

当 1974 年 4 月 25 日零点 25 分，葡萄牙里斯本的广播电台播放《高山之歌》(Grandola Vila Morena) 时，现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难以置信地于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播放这支曲子，是在给里斯本及周围的军队发出执行军事政变计划的信号，而这一计划是由领导“武装部队运动”(the Movimento das Forcas Armadas, MFA) 的青年军官们精心制定的。这一政变计划得到了有效而又成功的实施，只遭遇到安全警察部队的轻微抵抗。军队占领了关键部委、广播电台、邮局、机场和电话局。到早上晚些时候，群众涌入街道，为士兵们欢呼喝彩，并把康乃馨插在士兵步枪的枪管之中。临近傍晚时分，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塔诺 (Marcello Caetano) 向葡萄牙新的军方领导人投降。次日，他飞离葡萄牙开始流亡生活。就这样，产生于 1926 年一场类似军事政变的独裁政权终于垮台了——这个独裁政权由一位名叫安东尼奥·萨拉查 (António Salazar) 的严厉文官通过密切勾结军队而统治葡萄牙达 35 年之久。^[1]



因为政变更常见的是推翻民主政权，而非建立民主制度，所以“4·25”政变成为世界范围的民主运动一个难以置信的开端。它成为一个无意的开端，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建立绝非政变领导人的本意，更不用说引发一场全球性的民主运动了。独裁政权的灭亡并不确保民主的降生。然而，这次政变又确实释放了一大批在独裁期间受到压制的大众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力量。四月政变后的18个月以来，葡萄牙陷入了混乱之中。“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分裂为相互斗争的保守派、温和派与马克思主义派几大阵营。政党同样五花八门，差别很大，从左翼的奉行强硬路线的共产党，到右翼的法西斯团体。六届临时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是其权威却每况愈下。各色力量在为政变与反政变相互角力着。工人和农民罢工、示威，占领工厂、农场和媒体。1975年政变一周年时温和派赢得了全国大选，但是到当年秋天时，形势看上去有可能在保守的北部和激进的南部之间爆发内战。

葡萄牙的革命性剧变在许多方面看起来像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重演，卡埃塔诺就像是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四月政变就像是二月革命，而“武装部队运动”中的领导集团就像是布尔什维克，都出现了类似的波及广泛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更有甚者，在俄国曾经发生过科尼洛夫（Kornilov）阴谋事件，而在1975年3月的葡萄牙，却发生了斯皮诺拉将军（General Spinola）领导的右翼未遂政变。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并没能逃过敏锐的观察家的眼睛。1974年9月，葡萄牙社会党领导人兼临时政府外长的马里奥·苏亚雷斯（Mário Soares）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基辛格严厉指责了苏亚雷斯和其他温和派没有采取断然行动以阻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派的独裁。

“你就是一位克伦斯基……我相信您的诚意，但您太天真了。”基辛格对苏亚雷斯说。

“我当然不想成为克伦斯基。”苏亚雷斯回答道。

“克伦斯基同样也不想。”基辛格回敬了一句。^[2]

然而，事实上葡萄牙不同于俄国。在葡萄牙，“克伦斯基派”

获得了胜利，“民主”获得了胜利。苏亚雷斯接下来担任首相，后来又成了总统。而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宁”，名叫安东尼奥·拉马罗·伊恩斯（António Ramalho Eanes），这位在关键时刻动用训练有素的部队来制造自己期望的政治结果的人物，却是一位同情民主的沉默寡言的上校，1975年11月25日，他粉碎了武装部队当中的极端左翼分子的企图，从而确保了民主在葡萄牙的未来。

1974年和1975年间发生在葡萄牙的民主运动，是戏剧性的但又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地，到处迸发出并不显见的民主火花。1973年，巴西的梅迪西将军（Gen. Emílio Médici）政府即将离职的领导人们，提出了政治“卸压”（distensão）的计划；1974年，盖泽尔将军（Gen. Ernesto Geisel）责成他的新政府启动政治开放的进程。在西班牙，当全国都在等待着佛朗哥这位独裁者的死亡时，阿里亚斯首相（Carlos Arias）却谨慎地将佛朗哥独裁政权引向自由化的方向。在希腊，上校政权内部的紧张正在加剧，并导致这一政权在1974年中期垮台，进而到年末时，催生了这新一波转型浪潮中的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在随后的15年中，这一波民主浪潮演变成了全球性浪潮——大约有30个国家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型，而且至少还有其他20多个国家受到这一波民主浪潮的影响。

二、民主的含义

本书的主题是1974—1990年的民主转型。探究这一主题的第一步就是，厘清本书中所使用的民主和民主化这两个概念的含义。

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民主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然而，它的现代意义却只能追溯到18世纪末西方社会的革命动荡。20世纪中叶，在对民主含义的争论中出现了三种一般性的进路。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民主分别是根据政府权威的起源、政府所服务之目的以及组建政府的程序来加以界定的。



民主无论是根据起源还是目的来界定，都会带来模棱两可和不确切这些严重问题，因此在本研究中，将使用程序性的定义。^[3]在其他政府体制中，人们因出身、运气、财富、暴力、拉拢、学识、任命或考试而成为领袖。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治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对民主这一理念的最为重要的表述是由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于1942年时作出的。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部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中，熊彼特详尽阐述了他所谓的“古典民主理论”的缺陷，这种民主理论正是根据“民意”（起源）和“公共善”（目的）来界定的。在有效驳斥研究民主的这些进路之后，他提出了一种所谓的“另一种民主理论”。他说，“民主方法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而做出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通过竞争人民手中的选票，个体获得做出决定的权力”^[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争论的一方是那些决定根据起源或目的来界定民主的古典派，另一方是由坚持民主的程序性定义的理论家所组成的熊彼特阵营。到20世纪70年代，这场争论才以熊彼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理论家们日益注重在对民主的以下两种理解当中作出区分：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界定，另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性定义，并且他们还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后面这种类型的定义，才能提供分析的准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系，并因而使它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规范理论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民主争论急剧衰落了，至少在美国的学术争论中是如此，并且被对民主制度的性质、民主制度如何运行，以及民主制度发展和崩溃的原因的研究努力所代替。这种努力风行一时，是要使民主少一点赞美色彩，而多一点常识色彩。^[5]

本书沿袭熊彼特主义的传统，并在以下意义上把一种20世纪的政治体制界定为民主体制：它的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是经由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些选举中，候选人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几乎所有成年人都具备投票资格。根据这种定义，民主就包括了竞争和参与这两个维度——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把它们看成是他的